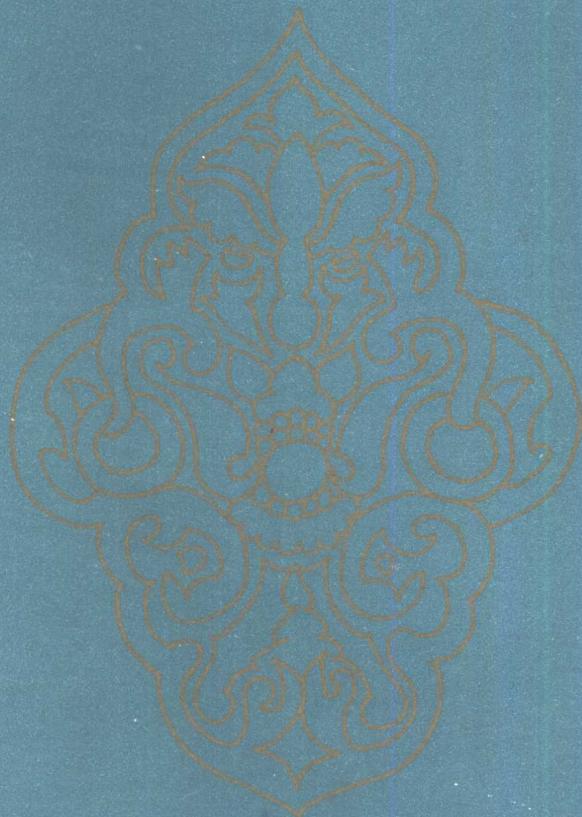


# 陶行知教育思想 研究文集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 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文集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 **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文集**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 编

\*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装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25 插页 1 字数 220,000

1985年12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200

书号 7012·1029 定价 1.65 元



過去現在未來創造分析  
陶行知題

照片是陶行知于 1936 年 8 月在巴黎参加世界和平会主席  
比巴塞的葬礼后留影。

题词引自陶行知《改作黄金时代歌》。

## 前　　言

陶行知先生是我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为了改革中国的旧教育，他奋斗了一生。一九四六年七月在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由于过度劳累，患脑溢血逝世。他从我国工农劳苦大众的实际情况出发，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前途着想，创办过乡村幼稚园、安徽公学、试验乡村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由他创立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是留给我国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既吸收了别国教育理论的长处，又继承了我国教育理论的精华；既反对“老八股”，也反对“洋八股”，是在中国土地上和人民中间经过长期教育改革的实践总结出来的，符合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与党的教育方针是一致的。要建设社会主义，人才是个重要问题，陶行知先生对如何培养创造性人才的问题，有他独到的见解。发掘、研究和继承、发扬陶行知教育思想中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积极因素，也是我们实行“双百”方针的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

解放后的一个时期，由于“左”的错误思想影响，陶行知先生曾遭批判。以后，陶行知的教育学说便成了“禁区”，无人敢于问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许多冤假错案得到了改正。一九八一年十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了纪念陶行知诞辰九十周年大会，恢复了陶行知先生的

名誉。由此，学术界的思想活跃起来了，很多热心教育科学的研究和教育改革的同志又开始重视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研究和实验。一九八五年九月，在北京成立了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中国陶行知基金会，对陶行知的研究起了更大的促进作用。

当前，全国人民都很关心教育改革。我们按照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活动及其对教育改革的现实意义，从最近三年学术讨论资料中选出二十八篇文章，编成《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文集》，希望能进一步引起教育界对陶行知先生宝贵的教育遗产的普遍的关注，并对学习和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

一九八五年九月五日

## 目 录

纪念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邓颖超	(1)
纪念陶行知同志，大力普及人民教育	胡愈之	(3)
追忆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张劲夫	(11)
论陶行知教育思想	刘季平	(20)
对陶行知先生的再认识	徐明清	(30)
忆陶行知的政治生活片断	吴树琴	(33)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	刘光	(38)
山海工学团是党在白区教育的一个据点	张健	(51)
生活教育思想与新安旅行团的教育实践	李楠	(56)
试论陶行知在育才学校的教育思想和实践	何国华	(73)
回忆重庆社会大学	杨乔	(84)
——从“民主讲座”到“社会大学”		
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精华及其时代意义	胡国枢	(96)
我对“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理解	许梦瀛	(112)
“教学做合一”的精神实质	康庄	(120)
“生活教育”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不断发 展丰富的过程	丁右涵	(130)
陶行知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教育 的批判	郭笙 刘硕	(141)
陶行知解放儿童创造力教育思想的研究	周洪宇	(153)

- “六大解放”的现实意义 ..... 马朋人 宋之保 (169)  
浅论陶行知的师范教育思想 ..... 莫增荣 (184)  
试办“艺友制师范教育”，培养千百万  
    乡村教师 ..... 盛克猷 (198)  
从党的总任务看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 丁 丁 (209)  
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办中国人民需要的教育 ..... 王昌畴 (220)  
陶行知教育思想与解放区教育 ..... 王 琳 (227)  
试论陶行知的爱国主义的教育救国之道 ..... 刘免庭 (242)  
陶行知与胡适 ..... 刘心村 (256)  
徐特立与陶行知 ..... 李 植 (261)  
学习陶行知先生的献身精神，为促进高  
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努力 ..... 操震球 (269)  
以陶为师，改革农村教育 ..... 丁冠英 (274)

# 纪念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邓 颖 超

今天是民族民主革命时期的著名的人民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陶行知先生诞辰九十周年，我们大家在这里集会隆重纪念他，是有重大的意义的。

陶行知先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由教育救国走上民族民主革命道路的一个典范。二十年代前后，他抱有教育救国的思想。从大革命时期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内，他从事平民教育运动、乡村教育运动和普及教育运动，谋求通过教育途径救国。“九·一八”事变以后，陶行知先生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他眼见国民党反动派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招致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极为愤慨；同时又听到中国共产党发出了抗日救国的伟大号召，非常拥护，并开始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一二·九”运动爆发以后，他就坚定不移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政策，投身于民族民主革命的斗争。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而奋斗。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坚决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和发动反人民的内战，为争取和平、民主而英勇斗争，直至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与此同时，陶行知先生就把他从事的教育活动，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结合起来。抗日战争之前，他从事国难教育运动，配合抗日战争，提出开展抗战教育运动；抗战胜利后，配合民主斗争，提出开展民主教育运动，为民族民主革

命斗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九四六年，他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猝然病逝。时年仅五十五岁。毛泽东同志亲笔题了悼词，称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周恩来同志称他“十年来，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陶行知先生一生光明磊落。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亲密战友。他后十年坚定不移地跟着中国共产党革命到死。他不避艰难险阻，不顾敌人威胁利诱、不计个人得失安危，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和人民教育事业而献身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的。我们开会纪念他，就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让我们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心同德，为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八日

# 纪念陶行知同志，大力普及人民教育

胡 愈 之

陶行知同志是我们永远值得纪念的民主革命家，爱国人士，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是大众诗人，革命战士，进步的思想家，而更重要的，正如毛泽东同志亲笔题词里所称，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他早年曾经受到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影响。一九一四年赴美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跟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孟禄研究教育。一九一七年回国以后任南京高等师范教授兼教务主任，主编“新教育杂志”和“新教育评论”。反对传统教育和洋化教育，改“教授法”为“教学法”。特别在“五·四”运动以后，他热心于科学、民主，首先重视乡村教育运动，在南京郊区晓庄创办了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后改名为晓庄学校，还办了中心小学八所，中心幼稚园四所，民众学校三所，以及中心茶园等事业。他脱掉西装革履，和师生一起生活、劳动，同甘共苦，和农民交朋友。

陶行知早年相信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一九二七年末曾写下了著名的《锄头舞歌》：“天生了孙公做救星呀，唤醒锄头来革命呀。”晓庄学校开始除无党无派的师生外，还有国家主义派分子和国民党党员。一九二八年以后，又参加了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成立了地下党、团支部，开展地下工作，同国家主义派、国民党作斗争。对这个问题，陶行知同志采取比较开明自由的办学方针，说晓庄是“自由园地”，允许各党各派存在。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允

许共产党同其他党派并存，这在当时是大胆的进步的主张。一九三〇年四月五日，晓庄师生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参加了支援南京下关和记洋行工人斗争和反对日本军舰停泊下关的游行示威。陶行知同志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保护革命青年。蒋介石下令于十二日封闭晓庄学校，陶行知同志遭到通缉，被迫避居日本。

一九三一年春，陶行知同志回到上海。他鉴于日本工业的发展和科学发达关系很大，得到《申报》馆总经理史量才的帮助，创办了“自然学园”。他组织编写《儿童科学丛书》，随后又创办了儿童通讯学校（函授学校），开展“科学下嫁”运动，即科学大众化运动。同时，着手发动普及教育运动。一九三二年在上海郊区创办了山海工学团。主要招收农民子弟，实行边工边读，并在农村儿童和群众教育中推行小先生制。

在此期间，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派员协助陶行知工作，并先后派人到工学团开展工作。陶行知同志依靠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合作共事。以后又组织普及教育助成会，在上海市区组织报童工学团、流浪儿童工学团，并在工厂区办工人夜校、识字班，在工人、穷苦群众和贫苦儿童中推行普及教育，进行抗日救亡宣传。这时他已经进一步认识到工人群众的重要，写下了《新锄头舞歌》：“光棍的锄头不中用，联合机器来革命。”在普及教育运动中提出了为工农群众的方向。一九三四年，他创办了《生活教育》半月刊。

陶行知同志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思想，在“九一八”“一·二八”事件以后，逐渐发生了变化。他目睹蒋介石对外屈膝妥协，对内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曾连续发表了大量政论性文章，抨击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另一方面他看到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战。特别是在长期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接触中受到影响，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革命事业才是中国希望所在。他把他的生

活教育运动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结合起来了。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协助下，他组织国难教育社，开展国难教育运动。“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给了他极大的鼓舞，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终于从教育救国的道路走上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道路。他开始反对胡适之流鼓吹杜威资产阶级教育的主张，坚决拥护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一九三六年他和沈钧儒、邹韬奋、马相伯等发起组织救国会，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一二八”抗战四周年纪念，他与沈钧儒带领近万的人民群众游行示威，徒步四十五里。以后经常参加群众的抗日救亡活动，发表演说。这年七月又和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主张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建立统一的抗战的政权。毛泽东同志曾写了回信，赞同他们的主张。十一月，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等救国会“七君子”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当时陶行知同志在国外访问，但又一次遭到通缉。

陶行知同志于一九三六年七月赴伦敦参加世界新教育会议。他还受全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会的委托，以国民外交使节的身份开展广泛的国民外交活动。先后周游亚、非、欧、美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很多国际人民团体的会议，开展对侨胞和世界人民的广泛访问、讲演、募捐等活动，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救国主张，争取世界人民支持，动员广大侨胞为抗日贡献力量。他的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抗日救亡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陶行知同志在伦敦时曾谒马克思墓，写下了这样一首诗：“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二四七四八’<sup>①</sup>，小坟葬伟大”，表达了他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敬仰。

一九三八年夏，陶行知同志回到香港。十月回到武汉，参加国

---

① 马克思的墓号。

民参政会。蒋介石曾拉他参加国民党，并请他担任三青团的高级职务，他加以拒绝。在国民参政会上，他提出推行普及抗战建国教育方案，决议通过后被国民党搁置一边。国民党威胁他说，你的学生和朋友中，很多是共产党。他回答说：“他们是否共产党我不知道，但就是共产党，他们办事认真，又有能力，一心为抗战、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以后他经常受到特务的监视。但是陶行知同志不为高官厚禄所动，不怕威胁、迫害而战斗不止。他始终拥护党的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方针，在参政会内外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抗战期间，陶行知同志提倡战时教育运动。他指出“要有全面的教育来配合以促成全面抗战”，“以争取最后之全面胜利”，主张“抗战建国的生活与抗战建国的教育结为一体”。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生活教育社在桂林正式成立，他被选为理事长。在香港创办了中华业余补习学校，动员华侨抗日。同时他更加明确地指出了“教育只是民族大众解放之工具”，提出教育在目前的任务是要争取抗战胜利，并创办了《战时教育》杂志。

一九三九年七月，陶行知同志于重庆筹办育才学校，从难童中挑选有特殊才能的入学，实现他的宿愿：“使得有特殊才能的幼苗不致枯萎，而且能够发展”，成长为人民、为国家民族贡献所能的人才和战士。育才学校是在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关怀支持下诞生的，并得到进步人士的支持，它政治上接受党的领导，建立了地下共产党支部，学校负责人和教职工大多是共产党员和进步的专家、青年，与他亲密共事，并肩战斗，大批在重庆的进步学者、专家先后来校讲课。它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一所进步的、革命的学校。招收的学生除难童外，还有一些革命干部、进步人士的子女。在不同的政治形势下，它以各种方式坚持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坚持革命的政治思想教育，师生参加生产劳动，

重视接近工农群众，并开展学校附近的群众文化教育和宣传工作，和群众建立了亲密的关系。重视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学习生动活泼，思想活跃。

国民党反动派一直用政治迫害和经济封锁等手段企图扼杀育才学校。一九四一年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时，育才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一批师生离校转移到解放区。陶行知同志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打破国民党派人控制学校的阴谋。在国民党统治区物价疯狂上涨的情况下，他到处奔走征募捐款维持师生生活，他节衣缩食，把募捐得到的款项全部用于维持育才学校，自己却常在重庆街头买两碗“小面”充饥，和师生一起艰苦奋斗。育才学校还学习解放区的生产运动，开荒种地，生产自救。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许多同志都先后到育才看望过、作过报告，对育才师生和陶行知同志十分关怀。陶行知同志和南方局的同志经常来往。每遇政治形势复杂多变时，不顾特务的监视，常于夜雾茫茫中前往曾家岩、红岩村找周恩来、董必武同志谈心。他曾对人说：“去时腹中空，回来力无穷。”他曾写诗赞《新华日报》说：“自己每天必读，随时还教别人。”他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曾高兴地说：“中国有救了！”他向往解放区，在为几位奔赴解放区的同志送行的时候说：“你们到了光明区，加紧努力！我只要还有一丝留在重庆的可能，我都要在这里奋斗！”

一九四四年，在日本侵略者的进攻下，国民党军队在湘桂大溃退时，一溃千里，大后方人心惶惶。育才学校根据党的方针，准备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并深入周围农村发动群众。在重庆街头演出延安秧歌舞，唱民主歌曲，并编出反映政治形势，发出就地抗战呼声的话剧在重庆演出，轰动一时，鼓舞了群众。育才师生一批批先后走出学校，有的投奔解放区，有的在国民党统治区参加革命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陶行知同志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以更大的革命热忱、以坚强的民主战士的姿态奋不顾身地投入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并提出民主教育运动。《战时教育》改为《民主教育》，并创办了《民主星期刊》，他发表了许多文章、诗歌，为争取和平民主和民主教育而大声疾呼。他指出新旧民主的区别：“旧民主是少数资产阶级作主，为少数人服务。新民主是人民大众作主，为人民大众服务”，“民主的教育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教育。”他说“民主教育一方面是教人争取民主，一方面是教人发展民主，在反民主的时代或民主不够的时代，民主教育的任务是教人争取民主。到了政治走上民主之路，民主教育的任务，是配合整个国家之创造计划，教人依着民主的原则，发挥个人及集体的创造力，以为全民造福”。以后又提倡社会大学运动，在地下党组织和民主人士的支持下，与李公朴、史良等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这是一个团结进步青年进行革命的政治教育和专业教育的文科夜大学。

毛泽东同志赴重庆谈判期间，陶行知同志作为人民团体的代表，多次受到接见。他为政治协商会的成功而奔走呼号。在出席重庆市进步人士公祭昆明学生“一二一”反内战运动死难烈士的追悼会前，他作了牺牲的准备，给生活教育社的同志写好了遗书。一九四六年一月在政协会议期间，他和李公朴等组织民主促进会在沧白堂举办讲演会时，国民党特务殴打讲演者和会议参加者，他和育才师生保护中共代表。政协会议成功，重庆各界在较场口集会庆祝，他组织育才、社大师生担负宣传和纠察工作，并向大家说：“纸上的东西，还要我们用行动去争取才能实现，我今天去开会是准备挨打，甚至流血的”，要大家也要作好思想准备。会上，国民党特务军警打伤郭沫若、李公朴，育才、社大师生也被打，他气愤地说：“要知道民主是需要用血、用生命去争取的。”

一九四六年四月陶行知同志到上海后，一面忙于育才迁沪等

工作，一面即投入反内战、反独裁的斗争。在他生命最后的一百天中，发表讲演一百多次，有时一天连续讲三次。六月二十三日，他在欢送人民代表赴南京请愿的群众会上高呼：“八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伪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七月间，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相继被国民党特务暗害，白色恐怖弥漫上海。陶行知同志得知自己被特务列在黑名单上的第三名，朋友们劝他多加提防时，他临危不惧，大义凛然地说：“我等着第三枪！”在他给重庆育才师生的信中说：“如果消息属实，我会很快结束我的生命”，“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号召一万个来顶补，平时要以‘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的精神培养学生和我们自己，有事则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相勉励。”他沉着冷静，坚持工作，整理诗稿，准备牺牲。七月二十五日，因劳累过度，不幸患脑溢血去世。

陶行知同志为祖国，为人民，为革命献出了一生的心血。但是他的教育思想是逐步发展的，在晓庄时期他曾经说过他是在“摸黑路”。到了三十年代中期，从参加救国会开始，他终于找到了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无保留地跟着共产党走，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以生命为代价，对中国人民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因此在他逝世时，周恩来同志在给党中央的电报中说：“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这是对陶行知同志的盖棺定论。由于他去世得过早，在解放以后有些人把他的早期思想、认识，看作是始终不变的。甚至把他时常运用的武训行乞办学的故事，对他进行指桑骂槐的批评。主张文化专制主义的江青就是这样来向这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进行恶毒的攻击的。因此，纪念陶行知同志，重新研究和学习陶行知伟大的人民教育思想，肯定他在革命教育事业中所作的伟大贡献是